

中国现代文学论丛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主办

第八卷 第2期



中国现代文学浪漫主义传统的形成与发展

上海沦陷区文学制度下的商业运作

“鸦片”的文化记忆与新时期小说中的罂粟
行走在历史边缘

论抗战时期田汉在桂林的戏剧活动及其意义

作为教育戏剧的熊佛西“农民戏剧”

抗战时期中国尚力话剧论略

1990年代中国主旋律戏剧之批判

“散文时代”的吊客话语

论《盍镇》的叙事艺术

台湾文学制度新世纪的裂变

殖民地身份认同与左翼倾向

台湾大学国文系主任乔大壮之生死探析

论严歌苓作品中多重压抑下的女性形象

“文革”文学与新时期文学中的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传统
作为空名的儒家思想

启蒙视域中的革命文学批判

中国当代戏剧史料学研究的重大进展



南京大学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论丛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Research

第八卷 第2期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主办
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代文学论丛. 第8卷. 2/胡星亮主编.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12

ISBN 978-7-305-10271-4

I. ①中… II. ①胡…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文学研究 ②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29127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编 210093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出 版 人 左 健

书 名 中国现代文学论丛(第八卷 第2期)

主 编 胡星亮

责任编辑 施 敏

责任校对 李廷斌

封面设计 赵 秦

照 排 江苏南大印刷厂
印 刷 南京玉河印刷厂
开 本 890×1240 1/16 印张 13.75 字数 270 千
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10271-4
定 价 32.00 元

发行热线 025-83594756 83686452

电子邮箱 Press@NjupCo.com

Sales@NjupCo.com(市场部)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董 健

副主任 丁 帆 温儒敏 陈思和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列)

丁 帆 王 尧 王中忱 王爱松 王彬彬

王富仁 朱晓进 刘 俊 杨 义 吴 俊

何锡章 陈平原 陈思和 张光芒 赵宪章

胡星亮 董 健 温儒敏

主 编 胡星亮

副主编 刘 俊 王爱松 张光芒

编辑部主任 张光芒

《中国现代文学论丛》编辑部

通讯地址: 南京市栖霞区仙林大道 163 号(邮编 210023)

南京大学仙林校区文学院 638 信箱

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电 话: (025)89686720 89684444

传 真: (025)89686720

E-mail: zgxdwxc@yahoo.com.cn

目 录

【文学史透视】

- 中国现代文学浪漫主义传统的形成与发展 王达敏 胡焕龙/1
- 上海沦陷区文学制度下的商业运作
——以张爱玲为例 王 璟/18
- “鸦片”的文化记忆与新时期小说中的罂粟 徐振阳/29
- 行走在历史边缘
——试论林纾其文其人 张雪韵 张志平/45

【戏剧研究】

- 论抗战时期田汉在桂林的戏剧活动及其意义 李 江/56
- 作为教育戏剧的熊佛西“农民戏剧” 陈爱国 方 婕/72
- 抗战时期中国尚力话剧论略 张 华/82
- 1990年代中国主旋律戏剧之批判 陈文勇/95

【文学现场】

- “散文时代”的吊客话语
——张承志散文研究之二 冯 尚/105
- 论《蛊镇》的叙事艺术 吴 情/117

编辑委员会

主任

副主任

委员

录 目

【台港海外形声】

- 台湾文学制度新世纪的裂变 古远清/123
- 殖民地身份认同与左翼倾向 马泰祥/140
- 以《台湾新文学》(1935—1937)创作群体为中心 杨荣庆/150
- 台湾大学国文系主任乔大壮之生死探析 孟丹青/163
- 论严歌苓作品中多重压抑下的女性形象

【博士论文选粹】

- “文革”文学与新时期文学中的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传统 李 旺/172
- 作为空名的儒家思想 袁一丹/189
- 周作人 1940 年代正经文章之再阐释

【研究述评】

- 启蒙视域中的革命文学批判 马俊山/203
- 序《革命与文学的深层互动》
- 中国当代戏剧史料学研究的重大进展 江 萌/212
- 评董健、陆炜主编的《中国当代戏剧总目提要》

中国现代文学浪漫主义传统的形成与发展

CONTENTS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Romantic Tradition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Wang Damin and Hu Huanlong/1
The Commercial Operations of Literature in Japanese-occupied Shanghai: A Case Study of Eileen Chang	Wang Jing/18
The Cultural Memory of "Opium" and Poppies in the Novels of the New Period	Xu Zhenyang/29
Walking at the Margin of History: On Lin Shu and His Works	Zhang Xueyun and Zhang Zhiping/45
Tian Han's Dramatic Activities in Guilin in the Anti-Japanese War Period and Their Significance	Li Jiang/56
Farmers' Drama Initiated by Xiong Foxi, as a Means of Education	Chen Aiguo and Fang Jie/72
On the Drama of Strength Worshipping in the Anti-Japanese War Period	Zhang Hua/82
Criticism of the Mainstream Drama in China in 1990's	Chen Wenying/95
The Elegiac Discourse of "the Prose Age": A Study on Zhang Chengzhi's Prose (II)	Feng Shang/105
On the Narrative Art of <i>The Town of Gu</i> (<i>Gu zheng</i>)	Wu Qing/117
The Fission of Taiwan's Literary System in the New Century	Gu Yuanqing/123
Colonial Identity and the Leftist Tendency: The Writers of <i>The Taiwan New Literature From 1935—1937</i>	Ma Taixiang/140

Qiao Dazhuang's (Dean of the Chinese Department of Taiwan University) Life and Death	Yang Rongqing/150
The Female Images Under Multiple Suppressions in Yang Geling's Works	Meng Danqing/163
The Seventeen-Year Subject and the Rural Subject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Literature and the New Period Literature	Li Wang/172
False Confucianism: Reinterpretation of Zhou Zuoren's Orthodox Works in 1940's	Yuan Yidan/189
Criticism of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From the Enlightenment Perspective: Preface to <i>Criticism of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i>	Ma Junshan/203
A Breakthrough in the Documentolog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Drama: Commenting on <i>The Complete Catalogue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Drama</i> by Dong Jian and Lu Wei	Jiang Meng/212

中国现代文学浪漫主义传统的形成与发展

王达敏 胡焕龙*

(安徽大学 文学院,合肥 230039;淮南师范学院 中文系,安徽淮南 232038)

内容摘要:在中国文学现代传统谱系中,浪漫主义传统是最重要的核心传统之一。它萌发于“晚明思潮”,滥觞于19世纪末由“西风东渐”酝酿的“情感解放”文学思潮,“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个人主义精神及新文学创作实践,为它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树立了艺术典范。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反叛精神和自由精神,是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区别于古代浪漫主义传统的基本精神。20世纪30年代的京派文学、40年代的新历史剧与新浪漫派小说、80年代以后的“朦胧诗”与蕴含着人道主义情怀的小说开创的浪漫主义思潮,从不同侧面与层面,延传着“五四”凝结的浪漫主义文学传统。

关键词:浪漫主义传统;个性解放;京派文学;新浪漫主义;新时期浪漫主义

20世纪浪漫主义一直被文学史家视为与现实主义并驾齐驱的文学主潮,但实际上,由于20世纪中国社会革命浪潮的冲击和民族危亡的威胁,浪漫主义始终没有得到茁壮成长。在中国文学的现代传统中,尽管它是仅次于现实主义的核心传统,但无论是在美学精神历史凝聚的厚重上,还是在社会影响的深度与广度上,浪漫主义文学传统都无法与现实主义比肩。

20世纪中国文学浪漫主义传统一方面根源于中国古典文学的浪漫主义精神遗产,另一方面孕育于19世纪末思想启蒙大潮下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和情感的解放。“五四”新文化运动从根本铸造了20世纪中国浪漫主义文学传统的现代美学品格。

* 作者简介:王达敏,安徽大学文学院教授,安徽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胡焕龙,淮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项目基金: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文学现代传统的形成研究(11BZW095)”、安徽省社科规划项目“胡适、陈独秀与中国文学的现代传统(AHSK09-10D158)”。

20 世纪 20 年代以后,在风云变幻的中国社会,浪漫主义文学几经起伏,呈现出“夹缝中求生存”的态势,始终以多幅面孔、迥然异趣的形态,或隐或显地延传着它的基本精神与美学品格;多舛的历史际遇使它成为最具传奇和悲壮色彩的文学传统。

一、现代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中外文化背景

20 世纪中国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及其文学传统的形成,首先得益于 17 世纪以来近代中国文化新思潮的哺育。它萌发于晚明个性思潮、前清人文思潮和晚清“新民”思潮,至 19 世纪末,在中西文化全面冲撞与交汇的形势下,西方浪漫主义文学的洗礼,启动了本土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现代化”进程。因而,它是民族文化传统与西方现代文化精神共同哺育的结果。

欧洲浪漫主义文学产生于 18 世纪末,兴盛于 19 世纪前期,其先驱是卢梭。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发端于英国和德国,随后传到法国和东欧北美其他国家。英国“湖畔派”诗人寄情山水、发思古忧伤之情的诗作,雪莱、拜伦充满反抗与战斗精神的政治抒情诗,济慈的抒情诗与传奇小说;法国早期浪漫派对幻想境界的悉心描绘、海涅的战斗诗篇;法国浪漫主义大师雨果、乔治·桑、大仲马颂扬人类之爱,揭露教会罪恶、描绘传奇人生的经典之作,以及俄国普希金、莱蒙托夫,美国欧文、爱伦·坡、惠特曼等,组成多声部的浪漫主义旋律,汇成汹涌澎湃的文学潮流。反抗外在束缚,追求人的解放与自由,是贯穿始终并渗透于各种形态浪漫主义文学的共同主题。它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传到中国后,立即催生了中国思想启蒙和个性解放浪潮下的浪漫主义文学萌芽,并使之发展成为“五四”浪漫主义文学大潮。

以人的解放为核心的“晚明思潮”尽管伴随着颓废、放荡与堕落,但现代中国个性解放历程,正是由此起步。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其对中国传统经济结构的突破,改变着人们的价值观念,拜金主义、追求奢华与享乐,成为新的风尚。众多工商业城市的崛起,产生了新兴市民阶层,他们疏离宗法故土,个性意识逐步增强,成为明代反叛纲常名教、个性解放的思想基础。男女两性的自由交往也成为社会时尚。人性舒展的空间前所未有地为世俗社会默许。这个时代,与几乎同时的南欧文艺复兴运动,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哲学的突破是“晚明思潮”及近世中国文化蜕变与转型的深层因素。程朱理学通过对“天理”的本体论证,及对人性二重性的发生论探讨,得出“存天理,灭人欲”人生价值论,成为近千年来纲常名教压抑人性的总表述。然而,理学内部的叛逆——“陆

王心学”以“心即理”哲学命题高扬人的主体意识与精神自由,建立起中国式人本主义哲学。它与康德、黑格尔强调的人的先验主体结构“为自然立法”哲学理念具有内在一致性。泰州学派把阳明心学引发的肯定人欲、高扬个性意识与主体精神的社会风潮推向极端。李贽在自然人性基础上提出“童心说”,理直气壮地张扬个性解放,从而引发了晚明社会反传统、反正统的思想解放潮流。这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革命、思想革命。在这种思想观念与审美风气下,“情性”成为文学的最高审美范畴,浪漫热烈的临川派及其代表人物汤显祖是这一时代主题的集中体现。他创作的《牡丹亭》就是这种震撼人心的“至情”赞歌,代表了明代浪漫主义文艺思想和艺术的最高成就,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生死不渝真情正是明代审美文化的制高点,是当时人性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作者把这种真情升华到价值观的高度,它实际上已超出了男女之爱的狭隘范畴,成为一种普遍的人类之爱,一种与封建理学相对立的爱的哲学。”^①在中国文化史上,没有哪个时代像晚明时代那样,在社会生活和文学创作中,把人的自然情性或者说“人欲”,置于人生哲学的本体地位,并极力张扬和推崇,形成波澜壮阔的“尊情”文学浪潮及其审美趣味。

清初统治者大力提倡程朱理学而遏制异端思想,包括个性主义思想,使得整个社会文化环境重归传统,“晚明思潮”落下了历史帷幕。然而其精神并未断绝,在清初到清中叶一脉相传并悄然“中兴”。钱谦益、黄宗羲、王夫之、叶燮等人的文学理论,李渔以其戏曲理论和艳情小说创作,王士禛的“神韵说”和袁枚的“性灵说”,都是从晚明到现代个性解放及其浪漫主义文学传统延传与发扬的重要桥梁。清初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唐甄等一批思想家对君主专制制度的批判,则使近世中国反传统思潮落实到政治层面,具有里程碑意义。

鸦片战争前后,社会上出现一批睁眼看世界的思想家。他们倡导社会改革和向西方学习,同时推动着新一轮思想解放和个性解放思潮涌动。康有为充分肯定建立在自然本性基础上的各种“人欲”,论证人追求自身利益、个体幸福和全面发展愿望的天然合理性,为现代中国个性解放思潮奠定了思想基础。严复以卢梭“天赋人权”思想为依据,系统论述了人的精神自由与人格独立在现代民族国家建设中的根本意义。梁启超认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②。在“新民”大潮下,一大批中国思想界先驱,竭力鼓吹人的解放,形成高亢的时代大合唱,标志着晚明以来以人的解放为核心

① 陈小舒:《中国审美文化史·元明清卷》,山东画报出版社2000年版,第227页。

② 梁启超:《新民说·少年中国的国民性改造方案》,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8页。

的思想解放运动,实现了历史性的飞跃。

表现在文学思潮上,则是尊情思潮。“晚明思潮”尊情与崇情的主题,以男女之情为核心,反对礼教压迫,体现为自然人性的解放。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中国文坛高涨的“情”潮,不仅延续着人性解放的历史主题,更在于民族与文化的深重危机,造成人们普遍的心理危机。“哭泣”,成为这种时代情绪的象征。刘鹗的《老残游记》正是这种感时伤怀之作,其《自序》可以说是正是“哭泣时代宣言书”：“棋局已残,吾人将老,欲不哭泣也得乎?”^①林纾在译述《巴黎茶花女轶事》和《黑奴吁天录》过程中,每以号啕痛哭表达其“时代的哀痛”。作品出版后引得海内读者同声一哭。中国现代史上这富有魅力、不可重复的“哭泣时代”,既是个体意识的萌芽,也是现代浪漫主义文学的“原动力”。

在这一时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是苏曼殊和徐枕亚的文学创作。苏曼殊(1884—1918),字子谷,原名玄瑛,出家后法名曼殊。他是父亲与一位日本女子的私生子,从小颠沛于出生地与故乡之间,受尽歧视与虐待。他在出世与恋世之间徘徊,在多情与绝情之际痛苦,真诚率性,自由放任,从而获得雅号“情僧”。20世纪初,以拜伦、雪莱为代表的西方近代浪漫主义文学传入中国,苏曼殊成为最早的译介者之一。拜伦的《赞大海》和《哀希腊》、雪莱的《冬日》等浪漫主义名篇,都经其几乎完美的译述,为中国读者所知。他把拜伦的豪迈热烈与雪莱的恬静柔美有机统一,形成自己雄浑豪迈而潇洒轻灵的浪漫主义诗风。苏曼殊以《断鸿零雁记》为代表的言情系列小说,多以一男二女模式,展开小儿女缠绵凄恻的爱情故事。人物形象、故事情节及情感意绪,带有鲜明的作者生活痕迹,堪称民初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先声和奠基之作。主人公缠绵悱恻之情,一是来自世俗爱情的相爱不成;而根本的“难言之恫”,则是佛门戒律与自然人性欲求之间的尖锐矛盾。两难中本真的生命体验,正是浪漫主义文学的本质特征。其次,苏曼殊小说开中国“自叙传”小说先河,而“自叙传”正是以个人主义为哲学基石的浪漫主义文学的又一重要特征。这恰被“五四”时期创造社作家和一部分文学研究会作家继承和发扬,形成“五四”文学独特的艺术风景线。第三,苏曼殊的诸多小说中贯穿着一个凝聚时代精神的艺术形象——飘零者。生活与精神双重的流浪者与孤苦者,是苏曼殊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独特贡献。这一形象,正是浪漫主义文学个性意识与主观抒情的艺术载体。它作为现代文学创作传统,被“五四”新文学全面继承,化为诸多作家笔下的“孤独者”和“零余者”形象。从某种意义上说,“五四”时期浪

^① 舒芜等选编:《近代文论选》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4—215页。

漫主义文学大潮的共同主题,就是这群患有时代忧郁病和孤独症的“孤独者”、“零余者”的内心独白和感伤倾诉组成的“时代歌声”。因此,钱玄同在与陈独秀、胡适等人讨论新文学建设的通信中,把苏曼殊与梁启超一同视为超出其时代的新文学开创者。^①

与苏曼殊呈珠联璧合之趣的是徐枕亚的《玉梨魂》。就人性解放、情感解放以及对20世纪中国浪漫抒情小说文体的开创和社会审美心理的积淀与铸造上,《玉梨魂》如同苏曼殊小说,都有着不容置疑的革命性、开创性意义。《玉梨魂》大胆突破了“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情教理论的桎梏,标志着人性解放和审美风尚新的历史开端:在西方现代人文主义精神启迪下,《玉梨魂》继《西厢记》、《牡丹亭》、《红楼梦》之后,公开为被“泛情哲学”所排斥的男女之“情魔”正名,承担并完成了激发现代中国人重新回到情感解放道路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起步的历史重任,标志着中国人性解放历程由“古典阶段”向“现代历史”的迈进。同时,《玉梨魂》以华美的骈文骊句,缠绵悱恻的主观抒情,实现了小说文体的革命性转变,并由此开创了民初文坛阴柔秾艳的审美风尚,开启了一个审美新时代。徐枕亚创作的“情感启蒙”之功,为“五四”浪漫主义文学的兴起及其传统的凝定,聚集了充分的社会心理能量,奠定了现代审美心理结构。“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后,那些“梦醒了无路可走”的人们,正是在这一情感趋向下,把浪漫主义文学迅速推向高潮。

二、“五四”个性解放与浪漫主义文学传统的形成

从某种意义上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现代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文化酵母,个性解放与个人主义则是浪漫主义文学的哲学基础。新文化运动之初,陈独秀在《青年杂志》上撰文,通过东西方文化对比,批判东洋民族家族主义对个人的压抑,为个性解放运动张目。^② 胡适在《易卜生主义》等文中更是大力倡导以独立人格为核心的“易卜生主义”。周作人通过系统阐发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灵肉和谐一致”的生活,指出了“五四”新文学发展方向。这些正是浪漫主义文学起步与成长的基石。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行列里,鲁迅的性情最鲜明地表现出浪漫主义气质。

^① 钱玄同1917年2月25日致陈独秀,《胡适全集》第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4—25页。

^② 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5—169页。

他以建立在尼采“超人”哲学基础上的个人主义哲学,通过大力呼唤“摩罗诗人”,促进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的诞生。在《文化偏至论》中,青年鲁迅强烈主张“尊个性而张灵明”,呼唤民族的“超人”诞生。^①在《摩罗诗力说》中,鲁迅通过对近代欧美“摩罗诗人”拜伦、雪莱、密茨凯维支、普希金、莱蒙托夫等的评述,高度赞扬他们勇于反抗一切压迫,为个性解放、社会解放、民族解放起而抗争的英雄品格,视其为欧洲19世纪前期“精神界之战士”、“精神界之伟人”。作者最后热切呼唤:“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②这正是20世纪中国呼之欲出的浪漫主义文学宣言书。鲁迅小说的意义是,实现了20世纪初的中国浪漫抒情文学由肤浅的情感宣泄向以独特生命体验为基础的“诗化哲学”的飞跃。

觉醒后的呐喊反抗与失败中的彷徨忧伤,构成了“五四”新文学时代情绪的二重奏。因此,鲁迅的《呐喊》和《彷徨》,在奠定了现代中国现实主义文学基石的同时,也奠定了现代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感情基调。鲁迅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被视为中国现代白话小说的开山之作,它以思想的深刻与艺术的独创,引发社会轰动性反响。小说表现“狂人”在发狂——思想觉醒之后独特的心态及决绝的反抗精神,那“从来如此,便对么”的勇敢发问,那对中国四千年“吃人”历史的深刻洞悉,那对吃人者的愤怒警告,那“救救孩子”的深切呼唤,尤其是“梦醒之后无路可走”的绝望等,都使这篇小说在象征世界中显示出浪漫主义战斗精神。这是近代“摩罗”诗人的呐喊在中国大地上的第一声回音。

此后,鲁迅小说在现实主义的真切与冷峻中大多融注了或浓或淡的抒情成分,构成其艺术特征的重要内涵,以至于后世学者多把鲁迅小说视为“诗化小说”。这里充满着“彷徨者”的惶惑忧伤(《在酒楼上》)、“孤独者”的决绝傲世(《孤独者》);《伤逝》中那浓重的感伤,《故乡》首尾的那份凄凉与憧憬,《药》中夏瑜坟头上的花圈,《社戏》中田园牧歌般的诗情画意等,无不生动地显现着作者的时代忧伤与美好情怀。而当这些“诗化”意韵最终被视为新文学创作的“典范”时,新文学创作的美学原则开始显现,浪漫主义美学精神便在其中悄然凝结。

在个性解放时代潮流下,作为主潮的现实主义文学,从“问题小说”到“人生小说”再到“乡土文学”,除极少数作家(如叶圣陶)外,无不洋溢着风格各异的主观抒情意韵,呈现出浪漫情调。即使以客观凝重为特征的乡土文学思潮,也以“感伤的故乡风”

^① 《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7页。

^② 《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99—100页。

染上浪漫主义色彩。直到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现实主义文学才陆续呈现出“纯”的面目来。

在20世纪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发展及其文学传统的凝结与变迁上,创造社具有继往开来的里程碑意义。他们饱尝各种人生艰辛,感应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代脉动,形成张扬的个性、丰富的情感和肆意冲动的浪漫气质,带着他们的浪漫主义诗篇,从日本闯回国内,造成浪漫主义“异军突起”的壮观景象,成为20世纪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实际奠基者。郭沫若在创造社成立之初就表示:“我们的主义,我们的思想,并不相同,也并不必强求相同。我们所同的,只是本着我们内心的要求,从事于文艺的活动罢了。”^①这“内心的要求”,实质上就是本着内在本心的冲动的“自我表现”;郁达夫的“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②的经典性表述,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创造社“自我表现”文艺观,概括出“五四”浪漫主义小说的重要特征。

这种多情善感的个性气质及“自我表现”文艺观的形成,与他们深受中外文艺思想尤其是近代西方浪漫主义文艺思潮的影响密切相关。郭沫若从小深受屈原、李白等浪漫主义艺术大师的熏陶,又深受庄子哲学和近代欧洲泛神论哲学的影响,故而养成豪放不羁、浪漫多情的个性气质。泰戈尔的自然恬静,海涅的清新明丽,拜伦的雄浑恢宏,歌德真诚热烈的自我表现,都引起他的情感共鸣。而对郭沫若浪漫主义诗风影响最大的,是19世纪末叶美国诗人惠特曼。他后来深有感触地说:“惠特曼的那种把一切的旧套摆脱干净了的诗风和‘五四’时代的狂飙突进的精神十分合拍,我是彻底的为他那雄浑的豪放的宏朗的调子所动荡了。”^③这种“合拍”与“震荡”的结果,就是1921年《女神》的出版。《女神》的出版,不仅意味着鲁迅14年前热切呼唤的中国“摩罗诗人”正式诞生,而且还标志着“五四”浪漫主义文学大潮由此兴起,并且奠定了浪漫主义文学的美学品格。这种美学精神具体表现在:“反抗—破坏”、“创造—再生”的革命精神,张扬自我的个性精神以及想象与创新的艺术精神。这正是“五四”时代精神的艺术展现。积压千年的苦闷要宣泄,黑暗的“铁屋”要破毁,时代已在等待全民族总爆发的那一刻。《女神》不仅成为个人郁积的喷火口,更成为整个民族痛苦灵魂的喷火口。在“反叛—创造”的时代精神中,《女神》的开创性意义显而易见,它以其典范性地位和深远影响,成就了现代中国浪漫主义文学大潮的开创者及其文学传统的奠

① 郭沫若:《编辑余谈》,《创造》季刊第1卷第2期,1923年8月25日。

② 郁达夫:《五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郁达夫小说集》下册,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28页。

③ 郭沫若:《我的作诗经过》,《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16页。

基者的历史地位。与这种“破坏—创造”革命精神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的,是思想上彻底觉醒、顶天立地的“自我”形象。这个冲决社会罗网、与宇宙伟力融为一体的大我,破坏神圣偶像,热烈追求个性解放,赞美自我那移山倒海、再造乾坤的创造伟力。飞扬的诗情、奇特的想象和自由奔放的体式,是郭沫若对现代浪漫主义文学美学形式的开创性贡献。雄浑奔放的阳刚之美,突破了古典文学温柔敦厚的“中和”之美,意味着中国抒情文学新时代的来临。奇特的想象,又以内在激情为动力,真正实现了新诗的飞扬。激情的飞扬与想象的驰骋,引发“诗体大解放”,“绝端的自由,绝端的自主”使《女神》真正成为不拘一格的自由体诗。这实际上是人的个性大解放、情思大解放的外在标志。

与此同时,郁达夫以低回忧伤情调抒写着“梦醒之后无路可走”的苦痛,把民初以来“尊情”思潮推向高潮,正式开启了20世纪中国浪漫抒情小说大潮。作为中国现代浪漫抒情小说大潮的主要开创者,郁达夫同样受到欧美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以拜伦、雪莱、歌德为代表的早期浪漫主义文学那强烈的个性精神、昂扬的进取精神和彻底的叛逆精神,构成郁达夫浪漫抒情小说潜在的思想价值取向。卢梭面对世俗那决不妥协的孤苦情怀以及为保持人性纯真而“回归自然”的美好情怀,引发了郁达夫的深深共鸣。欧洲世纪末的颓废感伤情调,日本“私小说”对自然人性的展览,以及俄罗斯文学中独特的“零余人”形象,与郁达夫弱国子民心态相共振,使其“自我表现”中弥漫着颓废感伤情调。

觉醒时刻的呐喊与觉醒之后的面对,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们精神世界普遍的发展轨迹,郭沫若飞扬的诗情与郁达夫颓伤的倾诉,构成了中国浪漫主义文学呈历时性深化关系的双重主题。因而,郁达夫的感伤潮头迅速取代《女神》的高亢,连郭沫若本人也很快以《星空》及感伤抒情小说,汇入这股情感潮头之中。

鲁迅等新文学先驱以尼采般的姿态,表现在“绝望”的生命体验中“反抗绝望”的生命哲学,在诗情与哲思的完美结合中完成“战士”品格的铸造。而创造社诸君在作品中抒写的是凡人的觉醒,虽有反抗的呐喊,但更多是颓唐的哀叹。作者以“零余者”自居,在某种程度上,“20世纪初期中国的浪漫小说,就是一群‘零余者’感伤的独白”^①。郁达夫的小说从两个方面显示了“五四”浪漫小说的特质:思想上对性的苦闷与生的痛苦倾诉,形式上把主观抒情全面融入小说,造成弥漫一个时代的小说美学情趣。这两方面与以苏曼殊、徐枕亚为代表的清末民初浪漫抒情小说都有着内在的继

^① 杨联芬:《中国现代小说导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5页。

承关系,但郁达夫把前人刻意隐藏、含而不露的东西尽情倾诉,使其浪漫抒情小说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沉沦》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出版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生动地描绘了留学日本的中国青年的“时代的苦闷”。这是郁达夫浪漫抒情小说的共同主题:“它集中地写‘穷’写‘色’,即描写青年知识界的经济生活和爱情生活。由于社会的金钱势力的压迫和封建礼教的束缚,这两个问题成了青年知识界个性解放的切要问题,浪漫抒情小说正是在抒写‘性的苦闷’和‘生的苦闷’中,抒发了时代的苦闷和人生的苦闷。”^①

这种惊世骇俗的取材加上作品的自叙传特征、强烈的主观抒情,尤其是受卢梭和日本“私小说”影响的自我暴露,开创了中国浪漫主义小说新范式,自然也就引发社会的强烈反响,思想守旧的读者攻击《沉沦》“诲淫”,而广大新青年读者多感同身受,思想与情感上与之产生强烈共鸣。一时间,效仿者纷起,遂演变成浪漫主义文学大潮。创作队伍以创造社郭沫若、张资平、倪貽德、周全平、陶晶孙、叶灵凤、冯沅君等作家为中坚,文学研究会的庐隐、王以仁、藤固,沉钟社的陈翔鹤、林如稷等作家,亦加入此创作潮流。他们以不同的情调、不同的色彩、不同的憧憬,汇成感伤、唯美、浪漫的审美思潮。郭沫若的自叙传小说同样有着郁达夫式的“零余者”形象和小知识分子穷愁人生的娓娓倾诉。不同的是,郭沫若小说虽有郁达夫式的自叹自怜,却少了郁达夫的颓废情调。王以仁、倪貽德、陶晶孙、冯沅君、庐隐等人生坎坷的青年作家,其作品中浓重的感伤与颓废笔调,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再现了郁达夫式的审美情调。有着“十里洋场”文化背景的张资平、叶灵凤、藤固等人,或在多角恋爱的编织中展示自然人性,描绘理想世界,或在现代都市与传统“志怪”的奇妙结合中传达人生感悟,等等,审美情趣可谓千姿百态。

在郭沫若的激昂呐喊和郁达夫的感伤倾诉二重奏下,新的浪漫主义美学精神在诗坛悄然兴起,它主要由20世纪20年代初的“湖畔诗人”、冯至及随后引领诗坛风骚的新月派诗人群体汇合而成,从而使“五四”以来的浪漫主义文学大潮开始出现一种走向精致与成熟的趋势。“湖畔诗社”诸人的创作引发了20年代的“情歌”浪潮,创造了“五四”浪漫主义文学美学精神的新形态,在现代中国浪漫主义文学传统的凝练基础上,“湖畔诗社”和新月社具有独立的美学意义和历史意义。

“湖畔诗社”诗人既缺少“五四”先辈们深切的人生体验和思想深度,又不具备同时代和稍后的新月派干将们深厚的中西方文学功底及美学修养,更没有“早醒者”们

^① 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32页。